

中国红色传说整理与正确认知的重要契机

□毕旭玲



我们在已出版和进入出版程序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几部书稿中发现其中不少传说文本属于红色传说，记录了地方红色革命斗争的历史以及民众对红色革命的认同，是非常珍贵的革命文化遗产。其实全国各地都流传着一些红色传说，有一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得到过初步搜集整理，而当前《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的编纂出版可以为全国各地红色传说在新时期的全面搜集整理和正确认知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

学者对红色传说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不多，其中的论文基本集中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这些论文对于红色传说的内涵、特征等还没有进行过仔细分析，因此也没有被广泛认可的结论，可以说，关于红色传说的一切还处于探索中。以红色民间叙事散文的分类问题为例，从已发表和出版成果来看，目前混称“红色传说

认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进入大众和学者视野的红色传说文本太少，无法基于大量文本研究得出可靠的、被广泛认知的结论。在此方面，《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正可以做一些填补空白的重要工作。

从具体分类上来看，红色传说属于历史传说。我们知道，民间传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人物传说、历史传说与地方风物传说三大类。因为产生于红色革命背景下，红色传说应该首先被归入历史传说类。但红色传说与一般的历史传说又有明显区别，是一种独特的历史传说。一般来说，历史传说叙述的内容距今都较为遥远，绝大多数历经了成千上万年的沉淀，而红色传说的形成与传播不过是百年的事情，是一种较为短暂的历史传说。受传统历史传说界定的影响，红色传说的合法性常常遭受质疑，学者对它的研究也显得犹豫不决，裹足不前。这是一种僵化的研究方法，不利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科发展。红色传说是一种历史传说，这是毋庸置疑的。它来源于真实的红色革命实践，是在真实历史基础之上的民间幻想叙事，其内容或叙述革命事件酝酿、发展的过程，或反映革命事件发生时各阶层、各方面人物的动态。据此，我们可以大致给红色传说下一个定义。红色传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实践过程中产生和传播的，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斗争过程，表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批判，表现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爱戴和拥护等相关内容的民间叙事散文。

作为历史传说的一种，红色传说的功能与历史传说的功能相关，但又有明显区别。历史传说的产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知道早期历史知

识和神话传说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上古史几乎就是神话传说构筑的历史。这既与早期先民以神话思维解释与记录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相关，也与先秦时期从事求神占卜活动的巫官与掌管天文、星象、历数、史册的史官往往由一人兼任而形成的巫史传统有关，所以出身于史官世家的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也辑录了众多来自民间的神话传说材料。可以这样说，民间传说中的历史传说最初就来自于用神话传说构筑的历史材料。所以古人对待传说，尤其是历史传说相当慎重，把它当作知识传承的工具、教育的工具，更依靠历史传说建构起了民族、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比如三皇五帝传说建构了早期华夏族群认同，夏商周历史传说建构了早期国家认同，史事传说的地方化又建构了地方认同。与此类似，红色传说也具有知识传承、道德教育与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红色传说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知识传承的工具，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更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的重要工具。

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的编纂出版为契机对中国红色传说进行全面搜集和正确认知是研究、宣传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此工作不仅将使一大批红色传说得到集中展示，也能在对比中显示出各地红色传说的不同特点。比如上海红色传说就表现出鲜明的城市性特征。作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初心之地，上海流传着相当多的红色传说，描述城市隐蔽战线斗争的红色传说与描述城市工人革命斗争的红色传说是其体量最大、最具特色的部分，且都具有鲜明的城市性。描述城市隐蔽战线斗争的红色传说产生于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斗

争重要战场的背景下。1927年11月，情报保卫工作的专业机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在上海成立，其故址在今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的一座两层石库门小楼中。从此，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中心。中央特科派遣忠实可靠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长期埋伏，创造了光辉的战绩，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留下了诸多传说，影响最大的是关于李白烈士的传说。1958年中国了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王苹执导，孙道临等主演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以李白烈士的传说为基础而改编拍摄的。这部电影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上海也是中国最早发生工人革命的城市。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1921年七八月间，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李启汉同志就领导了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最著名的上海工人革命是北伐战争期间的三次武装起义。工人革命在地方历史和上海市民中都有着巨大影响，促生了反映上海工人革命斗争的传说故事，因为周恩来同志担任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人职务，所以其中的不少传说都反映了周恩来同志的神机妙算。

中国红色传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革命历史传说，这既是中国红色传说的珍贵性所在，也是其研究与宣传的难点所在，因此必须整理出大量的红色传说文本以供总结和比较、梳理和分析。恰逢《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编纂出版之时，希望此次编纂出版也能成为中国红色传说的第一次大集合，为当代红色文化建设和红色文化认同的建构做出贡献。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研究室主任)

编纂中的“喜”与“忧”

□隋丽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辽宁卷·皮影戏分册》自2020年10月启动以来，编纂组对辽宁的皮影戏资源进行了多次摸底调查，在调查中既有令人欣喜的发现，又有对皮影戏现状的一些忧虑。

欣喜之一——辽宁省皮影戏影卷蕴藏量大、资源丰富，仅朝阳市凌源市文化馆现存传统影卷及现代影卷就高达300余部、3000余册。此外，在艺人手中保存的影卷数量也非常惊人，不完全统计也有数千册之多。根据编纂需要，通过拍照扫描复印的方式对300多部单出和折子戏影卷进行了存档，然后加以研究。这些影卷多为手抄本，既有清朝中后期的珍贵抄本，也有民国初年以及伪满洲国时期年代久远的手抄本，还有一部分手抄本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抄写的。这些手抄本完整地展现了辽宁省皮影戏近一二百年的发展历程。透过那些被反复摩挲的泛黄的毛边宣纸，以及散落扉页之间的飞虫残骸，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皮影戏演出史上的辉煌时刻。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了一部孤本影卷《药会全图》，书中人名皆以中草药药材命名，抄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应为辽宁皮影艺人在其他戏种《药会图》基础上的创编，相关研究和考证尚待展开。根据调研中发现的相关线索和大量影卷，我们拟将未收录的单出和折子戏再汇编成册。

欣喜之二——皮影戏在一些地区依然有活形态的表演，一些

皮影戏班子依然活跃在乡间、社区、景区和各类公共空间中。尤其是在凌源、喀左、岫岩、盖州等地，老百姓依然保持着请影戏的传统，丰收节庆、还愿酬影以及重要的活动中，还可以看到皮影戏班演出的场景。在凌源和喀左调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当地上了年纪的老百姓对皮影戏还是非常喜爱，逢有演出，便围在影台前投入地欣赏。

欣喜之三——一些皮影戏艺人锐意创新，努力地探索新时代皮影戏的传承之路。通过商演、皮影戏进校园、皮影戏体验课等方式，将皮影戏推向城市公共空间和中小学校园，让孩子们有机会体验和欣赏皮影戏，并亲自动手制作和学习表演。这些探索既增加了皮影戏艺人的收入，又扩大了皮影戏的传承路径。也有一些皮影戏艺人利用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直播和推广，也扩大了皮影戏的影响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皮影戏和艺人的社会知名度。

欣喜之四——一些皮影戏老艺人和皮影戏班依然在坚守皮影戏艺术的传承。他们有的教授弟子、传承皮影，有的著书立说，为家乡的皮影戏写传，留下一手资料。他们在传承的同时，也在精益求精地提高艺术水平，在皮影戏研习班和地区文艺调研的驱动下，组织队伍下力气打磨精品，促进了皮影戏艺术水平的提升。

欣喜之五——皮影戏传承队伍中有了新生力量。辽宁省的皮影戏传承人队伍及艺人群体与其他非遗门类相类似，都是以六七十岁以上的老艺人为主，鲜有年轻人。在对辽宁省皮影戏调研中，我们发现，皮影戏艺人中也有几位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中坚力量。尤其是沈阳辽中一位年轻的皮影戏传承人孙旭东，只有24岁的他受到姥爷影响，从10岁起就开始正式学习皮影雕刻和演唱、操纵等技巧。他对皮影戏影卷有深厚的积累并颇有研究，十余年来搜集整理了100多卷影卷。孙旭东善于利用快手等平台进行推广，在他周围聚集了一些喜爱皮影戏的年轻人。年轻人是民间艺术的未来，皮影戏传承队伍中年轻群体的出现，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事情。

总体上看，辽宁皮影戏虽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在当代社会依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在调研中，一些现象也令我们深深担忧。

最大的问题是皮影戏艺人的生计问题。对于民间艺人来说，有“活”才有“路”。当一门艺术或者手艺无法谋生时，那么，这门艺术很难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传承。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皮影戏艺人多数处于“兼职”状态，即平时务农或者出去打工，有皮影戏演出的活儿了，他们才又支影棚，操起影人。即使是国家级、省级、市级传承人也都是如此。能够专心从事皮影行当的，一般都是有生活保障，比如有退休金。对于大多数皮影戏艺人来说，单靠皮影戏很难养家糊口。当然，也有少数一些皮影戏艺人能够联系到一些演出的机会，可以到村上、镇上或者景区去演出，收入能够补贴家用。由于皮影戏演出机会少，收入低，也直接影响了皮影戏的传承，一些传承人坦言，没有年轻人愿意跟着学，因为不如出去打工挣钱多。解决皮影戏艺人的生计问题，不仅关系到皮影戏艺人本身的生活维系，也关系到未来皮影戏是否有人传承的问题。

如何改善皮影戏艺人的生活条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对于皮影戏的传承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单纯依靠政府和文化部门出资，并非长远之计。完善市场机制，出台一些鼓励性的措施，在文旅融合中非制定一些保护性的政策和措施，为传承人提供更多的演出机会，这或许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另外一个忧虑是皮影戏艺术的创新问题。任何一门艺术如果不创新，就会逐渐失去生命力。创新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需要皮影戏艺人们钻研技艺，展示绝活，同时又能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探索出新的内容和形式。目前由于行业不景气，创新动力不足，全心投入创作的人才匮乏，亟须对创新型的皮影戏人才给予鼓励和扶持。

此外，皮影戏的未来依然是在年轻一代身上，需要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比如通过皮影进校园等活动发现一些好苗子进行重点培训，同时对一些年轻的皮影戏传承人和艺人要多给予一些关注和关心，多给予他们机会，帮助搭建平台，使他们能够有机会进行艺术实践锻炼，参与演出和展示，使年轻艺人对皮影戏的前景有期许，能够看到职业远景和希望。

(作者系辽宁大学副教授)

从「剧目鉴别表」看新中国戏改中

对陕西小戏剧本的鉴审、改编

□柳茵

在陕西地方戏中，大量表现普通百姓生活的小戏，以清新活泼的样式，承载着民间朴素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底层民众中抑恶扬善，教化民风。它们文辞清新、表演自然，与底层民众的生活、情感亲近交融，深具地方文化气质。

然而，小戏毕竟大多来自于民间，其文本中或多或少会掺杂“粗俗”“轻浮”的语言；因说唱、歌舞传统的遗留，其表演风格会过于松散；表演中会有“格调不高”的表情、体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戏质朴天然、健康纯净的气质。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小戏中“封建色彩浓郁”“基于旧社会人伦关系、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情感与趣味”还与当时积极追求的“新社会的理念”相悖。因此，需要通过鉴别、审定，对小戏进行调整、改编，从文本开始，提纯小戏中“具有教育意义的主题”，完善其表现手段，提升其思想性、艺术性。

在陕西，这项工作曾主要由1952年成立的“西北戏曲流行剧目修审委员会”、1953年成立的“陕西省戏曲修审委员会”“西安市流行剧目修审委员会”等多家机构共同推行。“陕西省戏曲修审委员会”于1957年更名为陕西省剧目工作室，为现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初期，包含众多小戏剧目在内的陕西地方戏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成果，大多以整理改编本的形式存放于剧目工作室(现陕西省艺术研究院)资料室。

这批剧本中，部分在正文前另附一张“陕西省戏曲剧目工作室传统剧目鉴别表”(以下简称“鉴别表”)，填写项目有剧目主题、鉴别意见、负责人意见等。内容均为表格成型后，由鉴别组手写填入，填写时间为1957年3月至7月。其中，作为鉴别表主体部分的鉴别意见，体例规范：一般先就剧情做介绍；接着，分别从思想内容、结构、人物形象、剧情是否存在不合理之处，是否有封建迷信、海淫海盗成分等方面对剧目做甄别与评定；最后确认剧目是否适合演出。而表格末尾的“负责人意见”则是对鉴别意见提纲挈领式的归纳总结。

小戏剧本的鉴别表，是在此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陕西卷》的编纂过程中被发现的，仅涉及秦腔、眉户两个剧种，共十二份。虽然数量有限，但从中可以窥见特定历史时期对陕西地方小戏剧目基本的评判态度和改编思路。

在思想内容方面，鉴别意见除集中于剔除小戏中“粗俗”“轻浮”的语言、内容外，尤其重视挖掘小戏中“丰富的民间情趣”。

《小寡妇上坟》又名《柳绿敬中状元》，来源于民间传说，讲述肖素贞之夫柳绿敬上京赶考，被误传客死京地。数年后，肖素贞上坟祭祖，与柳绿敬相遇，夫妻互道年近，不敢相认。该剧曾由秦腔演员在京演出，风行一时，后成为京剧小丑、跷工小丑舞蹈歌唱的名剧(又名满台飞)，京剧王福山、于连泉均曾演出此剧，秦腔反而一度失传。后经整理，恢复秦腔演出并被蒲剧、河北梆子等多个剧种移植、搬演。对于此剧，鉴别组首先提出“在表演时去掉其色情成分”，同时，对于这个戏中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情趣，鉴别组的赞赏态度亦非常明显，认为这是一个“充满着生活趣味的小戏”“保留着民间歌舞的朴素风格”“语言生动，生活气息浓郁”，进而建议该剧“作为保留节目持续演出”。

作为典型家庭伦理剧的《比翼鸟》同样受到了来自鉴别组出于民间视角的关注。尽管对于这出戏中色情意味的词句和动作等，鉴别组的整改态度明确，但同时还赞扬了这出戏民间表演形式的“诚朴风趣”，认为它借用“夸张逗趣的乡野流言”及“对比强烈的人物色彩搭配”，以轻

松活泼的形式接触到“社会问题”及沉重的“家庭教育问题”。

《山西娃办婆娘》与《山西娃打锅》是两出秦腔丑角闹剧。这两个看似荒诞的戏，却均因其“浓厚的生活积累与独特的讽刺手法而显得与众不同”，被鉴别组评定为“民间的生活细节、生活语言的运用老道娴熟”，“讽刺意味含而不露却耐人寻味”，“看似闹剧却深具民间气质、充满了民间智慧”的“趣味小戏”。与此类似的还有眉户《走南阳》，因“刻画了两个儿童纯真可爱的内心活动”，被认定为“一出很有风趣的儿童喜剧”。

鉴别意见还对一些剧本中透露出小戏的舞台表演形式，从不同角度予以了关注。比如孙仁玉在民国初年为易俗社编写的喜剧小戏《偷鸡》(又名《女婿偷鸡》)。鉴别组特别为此剧在行当设置与表演细节方面提出了建议：“必须有好小丑，道白清楚，动作活泼，好小丑才能演出诙谐趣味”。又如眉户《铁角坟》，鉴别组对其中一些角色以丑行扮演颇为认同，认为“只要将低俗的语言删改，可长期以丑角扮演这些人”。

针对传统小戏中一些承袭自说唱、歌舞、较为“松弛”的表演方式，鉴别组提出了异议。比如眉户《姐儿熬娘家》中穿插的一段与剧情毫不相干的歌舞表演，鉴别组就以“破坏戏剧的连贯性”为由，建议将其删除。又如眉户《老换少》中占便宜与占妻间一段偏离主题的相互调侃，眉户《狐狸缘》中“支离的情节”及“张来兴与情节无关、喧宾夺主的出场”，鉴别组也建议对其“删除或修改”。

以“剧种传统”“剧种个性”保护为出发点的建议也在鉴别意见中可见。比如在眉户《宋江杀楼》的“负责人意见”中，组长李静慈除了提出“该剧应作为传统节目予以保留”外，还建议该剧在表演时，应“尽量避免秦腔化的唱腔与表演方式”。鉴别意见还从句牌、唱腔、词格等角度确定了剧目《林英哭五更》的剧种归属。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或在流传过程中的保护失当，目前仅发现十余份类似形制的小戏剧目鉴别表，其填写时间为1957年3月至7月，恰好处于文化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之后，与1957年4月10日至24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1957年3月5日举办的陕西省剧目工作会议几乎同时进行。这三次会议对于这批鉴别表的影响不言而喻。尽管在对剧目封建伦理道德取向的纠偏，粗俗、色情语言、表演的删改等方面，鉴别组立场坚定，态度明确，但剧目中富含民间情味的戏剧表达也得到了来自鉴别组积极的肯定或赞赏。鉴别意见较少以阶级成分来判定剧中人物的好坏，而是更重视人物形象、人物行动“是否具有民间趣味”。在评定小戏剧本中的音乐、表演、舞美等内容时，鉴别意见还十分强调其剧种的传统与剧种的个性，注重剧种的表演艺术风格与行当特征。这种既在可能的范围内尊重剧种的传统价值，同时又兼顾综合提升剧目艺术质量的评判态度，无论对于后辈的传承者还是观演者，都可以说是一种经验。

(作者系陕西省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辽中皮影艺人孙旭东